

任均◎口述
王克明◎撰写

我这九十年



1920—2010

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我这九十年



1920-2010

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 均 口述

王克明 撰写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75-3228-9

I. ①我… II. ①任… ②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736 号

我这九十年

著 者: 任 均

责任编辑: 吴 晶 黄 鲁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

投稿邮箱: hwcb@126.com

电 话: 010-58336190 010-5833626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965×655 1/16

印 张: 22.625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228-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宗 璞

任均老人是我母亲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纪和大姨相差近三十岁，和她的甥辈我的长姊冯钟琰、表姐孙维世相仿。父母亲去世以后，亲友渐疏，有三家老亲仍时常来往，给我关心和支持。照我的称呼他们是七姑、七姑父（冯纘兰、张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达），三姐、又之兄（冯钟芸、任继愈）。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现在是唯一比我年长的长辈。每个人的离开仿佛都带走了一条连接历史的线索，关闭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应该写下她的记忆，何况她的记忆是那样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进步，倾向延安，他的思想从不停滞，能够清醒地对待现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他确实说了，写信面谈他都做了，只不知起了多少作用。

六姨是由外祖父亲自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上世纪40年代末，六姨和六姨父全家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清华园乙所。那时人们对“解放”充满了憧憬，并有一种神圣感。清华园中许多人都知道我家里住着延安来的亲戚。梁思成先生特来造访，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也许他是想造一座。那时的人是非常天真的。

50年代中期，六姨夫妇转到外交部工作，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表弟、表妹们都还小，上寄宿学校，一到放假都住在我家。那时家里还有我的三个外甥女，一大群孩子，十分热闹。大表弟王延风乳名坦坦，1943年在延安出生。最初是冯牧同志告诉我这名字的意义。一转眼坦坦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几十年间我们又经过了多少坦白交待。

冯牧还说，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六姨父王一达是导演，很得好评；六姨是平剧院的主要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可惜后来不演了。这说法六姨自己倒没说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姨的面容越来越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她的年龄已经超过母亲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隔些时不见就会想念，而母亲无论怎样想念也见不到了。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羨。

一本回忆录，除了内容以外，还要依靠写作的能力，如文笔、剪裁、结构等。《我这九十年》的执笔人——我的二表弟王克明，是担得起这项重任的。

去年，表弟、表妹们为六姨做九十岁大寿。能够为父母做九十大寿是子女的福气。延安食府的墙壁上贴着当年延安的照片，其中就有六姨。我因一年都辗转医院，未能前往。我想，会有许多不到场的祝愿欢喜飞到了那里。

六姨一家议决，由我为《我这九十年》作序。我虽久病，却不能辞，况且话都是多年来积在嘴边上的，不必搜索枯肠。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2010年3月

写在前面

任 均

2004年的清明节，老伴王一达去世近一年时，我在为他的文集写的序里说：“一达可以心安了。但我还有事情要做。一达和我还曾经约定，把我们这几十年相识的人、经历的事，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有用。我已耄耋，这是我最大的事情。”

我曾跟一达说，想写下我父亲的一生。因为在我眼里，父亲任芝铭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觉得他很传奇。“文革”中，一百岁的父亲在临终前，不断呼唤我的名字，想见到我。我却被“军宣队”管制着，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每念及此，我都万分难过。

对自己的父亲，我记得很多。父亲自己和母亲、姐姐们，也给我讲过很多。我还存有很多父亲手书信件等史料。而且，一达两次陪我回河南新蔡老家，找到与我父亲相交数十年、一起走过抗战和内战年代的王灵轩、王鹏、任馨寰等许多老人，和许多亲戚，谈了很多，并开了几次座谈会，积累了相当资料。我们还联系到以前新蔡地下党负责人李广涛等老同志，知道了父亲的更多事情。我和一达曾写了篇父亲的传略，之后继续积累，意图厚积薄发。

为写父亲做准备时，我常想起我的姐姐和姐夫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姐姐的关爱，家人的温情，逝者的宁静，生者的亲情，都使我念念于心。家人们为国为民，做了许多事情，有些甚至很不平凡。然而，在“文革”中，全家人多受冤屈，甚至冤死。人死后，还被贴抹涂鸦、不得安宁。每想到这些，我都心痛泪流。所以，一些家人往事，我也想写。

一达觉得，家人的故事，贯串了我的一生。同时，还有其他许多记忆深刻的人和事。自抗战初父亲把我送到延安，我和一达共同走过了六十多年。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我们和周围许多人一起，经历了艰苦生活、胜利喜悦，也经历了政治运动、人事变迁。现在，大部分朋友陆续故去了，大多数故事也不为人知了。但那许许多多事情，有的能显出人格品德，很有些道义真情；有的能翻出历史真相，可作为前车之鉴。这些事情，为了孩子，也不能不写。

可是一达先走了。这本书还没动笔，他就一觉睡去，再没醒来。一达带走了他所有的记忆，留给了我一张白纸。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有悟：现在，才真的可以写这本书了。因为一达给我腾出了时间，我不用再为他的衣食起居，费心尽力了。于是，我从自己出生的家庭开始，把对父母、对青少年时候家庭的一些记忆，把对朋友真情的一些记忆，写在纸上。那些留了几十年、近百年的信件和照片，能勾起我更真切的思念。可这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了。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我对孩子们讲了，他们都支持和帮

助我。2005年，二儿子克明开始帮我整理口述录音。他的提问，一次次帮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几年间，在我口述的范围内，他帮我梳理研究史实，建立篇章结构，反复取舍修改。最后他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二十多万字的写作。

在我九十周岁的时候，孩子帮助我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真使我高兴！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我对孩子反复说过，我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即，说我所知，写我所知，有一说一，真实诚实。这一点，孩子听话，做到了。

人到九十，自然而然，浮华若烟云，心静如止水，故人在故地，往事俱往矣。但是，也许所有的往事，对后人都有用。

我还想说，《我这九十年》只是一本个人的记忆，原来是想留给孩子们的。

2010年6月

目 录

序 言 / 宗璞	001
----------------	-----

写在前面 / 任均	001
-----------------	-----

我的父亲任芝铭	001
---------------	-----

1.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2. 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
3. 劫救革命党人而亡命天涯的“乱臣贼子”
4. 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的老同盟会员
5. 捐产办学、为国育人的老教育家
6. 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术的“国军”老兵
7. 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
8.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9. 红卫兵走后，老人问：“是不是政变了？”

我们六姐妹	071
-------------	-----

1. “五四”时，四姐任焕坤写道：“尔辈欲作亡国奴乎？”
2. 捧读《红楼》的五姐任叙坤，忧郁早逝了
3.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4. 大姐任馥坤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烜
5.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

我与外甥女孙维世 125

1. 我和维世一起逃学，一块儿跪着挨训
2. 我俩化名姐妹去上海学表演，江青也来讲过课
3. 维世让我考鲁艺，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4. 我跟维世一块儿解馋，她的来信我保存了七十年
5. 维世感情专一，保了金山
6. 三姐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7. 维世“文革”三次溜到我家，她让我烧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8. 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我学话剧演京剧的经历 157

1.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2. 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
3. 分配到鲁艺平剧团，毛主席请我们听京剧唱片
4. 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
5. 调晋绥军区平剧院，在杨家沟听周恩来讲“赛尔敦性格”
6. 没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哪敢演？
7. 一离开延安，我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延安生活记忆 187

1. 被冼星海动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2. 上趟厕所回窑洞，炕上就挤不进去了
3. 窑洞塌了，我一家三口被埋在里边
4. 驴失前蹄，我和孩子都摔出去了

5. 马背上，一边筐里是行李，一边筐里是儿子
6. 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

我在延安生孩子 207

1.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2. 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
3. 求人帮我烧了块热砖，我的腿脚才暖和起来
4. 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纪念石畅 223

1. 坦白运动的“坦白”，重要性不在于内容真假
2. “抢救运动”中，不编假话的石畅上吊了
3. 运动后，我听康生说：“其实石畅没什么问题。”

三遇杨之华 231

1. “我是瞿秋白的老婆，我叫杨之华”
2. “名世已经牺牲了，别告诉你二姐”
3. “真巧，在这儿又遇见了！”

重逢于陆琳 237

1. 真奇怪，我俩怎么这么一样啊？
2. 我把母亲留给我的翡翠戒指送给了小于
3. 三十年后，她把辗转保护下来的戒指还给了我

珍贵的友谊 247

1. 我和阿甲一起，穿着现代服装演《打渔杀家》
2. 没想到左荧、黄灼在坦白运动中被诬为特务
3. 我儿子从山上滚落，张一山在山下一把接住
4. 牟决鸣从重庆给我往延安捎来一大包水果糖
5. 王镇武说：“任均？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6. 马新送来好消息，几天后我却接到她的讣告

“运动”的记忆 267

1. 老艺人真诚严肃地说：“这回共产党可玩儿了命了！”
2. 江枫把自己吊死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了
3. 我相信最后。只要活到最后，就一定能搞清楚
4. 想不明白为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难忘玛丽娅 291

1. 丁嫂的小脚没通过外交部的审查
2. 外交部给保姆尹嫂也发置装费
3. 保加利亚的党组织给我请来保姆玛丽娅
4. 玛丽娅真舍不得小卡林，哭着要跟我来中国

我和瑞萱 307

1. 从楼道里带回来的肝炎保姆
2. 地主的儿媳妇帮我勤俭持家
3. “文革”她被轰回老家，成了专政对象

4. 再没人轰她走了，她却永远离去
5. 然后，她不再是“五类分子”了

一达生病 319

1. “我又活着回来了！”
2. 输血染上了丙肝病毒
3. 他给孩子讲了那么多过去的故事
4. 孩子告诉了我病情真相
5. “我想好好睡一觉，你们谁也别叫我”
6. 风雨同舟六十载，悠悠死别肠断魂

后 记 / 王克明 339

我的父亲任芝铭

1938年寒冬，70岁的父亲在他秘密的陕北之旅中，把我送到了满目疮痍的延安。他这次辛苦劳累的颠簸北上，永远地决定了我的人生。

上世纪60年代，我和姐姐们、还有外甥辈们约好，1969年一起去给我父亲做百岁大寿。因为父亲一直很健康，我们都相信他一定能更长寿。没想到，遇上“文革”乱世，父亲郁郁而终。

我的父亲任芝铭是1869年出生，一百年后的1969年去世的。

1.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我小时候，家境宽裕。及长，才知曾经家道艰难。我听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早年间挑着担子从山东逃荒到河南新蔡的县城贫民，无田无地，以贩卖青菜为生，所得仅可糊口。母亲讲，爷爷虽然穷，但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便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一点儿便宜都不占。他坚守他的为人准则：“穷也穷个干净。”我的奶奶则勤俭持家，苦度岁月。父亲在这样贫寒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爷爷虽然穷，但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决心让我父亲读书，指望他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改换门庭。可是，1877年父亲八岁时，该念书



父亲任芝铭中年时期

了，爷爷却拿不出钱来。幸得我崔氏姨妈资助，父亲才能入读私塾，得不废学。后来，1888年，他十九岁考过童试，以秀才入学，后从温泽瑶先生读书。据说二十岁补为廪生。

父亲是1869年阴历六月四日出生的，原名近三，字子勉。曾因逃亡化名，以子勉改用志民、珉、芝铭。他生活的年代，婚姻讲究媒妁之言。我的母亲年轻时，父母早亡，兄嫂做主。媒人提亲给她说我父亲时，她的嫂子嫌我父亲家穷，不愿意。但是我母亲自己同意，一定要嫁。她说：“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母亲名张梦吉，1873年出生，比我父亲小四岁。她哥哥是读书人，教她识了些字。母亲不算有文化，但却不保守，曾响应父亲提倡，在县里带头放脚，把我几个姐姐裹的小脚全放了，还当过新思想启蒙时的妇女协会会长，在县里领头查妇女放脚，挺能干的。那时候县里有个张秀才的孩子留洋归来，思想现代，关心地方，有关放脚之类妇女解放的事情，常到我家里来找我母亲商量。在清代晚期那样一个中原小县城里，母亲的观念属于比较解放的。

按说，父亲补廪生之后，有廪饩津贴，但婚后多年，家里一直缺吃少穿。从1890年在罗庄教读开始，父亲在李宗白、刘思厚等人家中坐馆教塾几年。1895年，他自己在家开设私塾。1897年起，又在李士厚家和小南海、马营及邹寨等地坐馆多年。那些年，有刘粹轩、刘积学等数十人从我父亲读书。教读收入不高，家里仍很清贫，母亲遇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就跟我姨妈家借粮食。母亲曾回忆，我三姐任载坤小时候常对她说：“娘，吃白馍，拉白屎，吃黑馍，拉黑屎。”二姐任锐跟我说过，那时，母亲的娘家是开染坊的，有名气，四方人都上他们家染布，比较富

裕。因我们家穷，穿得不好，他们办红白喜事时，便不叫我们家的人参加。

苦读诗书改变了父亲的境遇。1903年，他三十四岁时，在清朝最后一次乡试中，中为举人。报子骑着马来报喜时，周围很多人听说了，都跑来看，里里外外，喜笑颜开。报子报喜，新举人家得招待好饭食，母亲就赶紧跑到我姨妈家借白面，现和现擀，煮出来一锅面条。

现在有个词叫“清末举人”，父亲便是。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到过一套银质的酒杯、筷子、戥子等，放在精致的木盒子里。那是父亲中举时，清朝政府颁发给举人的东西。还有清朝发的衣帽，但没见父亲穿过。中举后，门庭算是改换了，爷爷的理想实现了，可是他已经在1897年就去世了，没看见。父亲记1897年：“是年春丁父艰。”那时，父亲在任庄买墓地安葬了我爷爷。那墓地原来叫柏树林，有三十二棵柏树，很粗大。后来我母亲在那跟前买了三间草房。再以后，1958年，柏树全被砍去盖公社礼堂了，那儿就没大树了。从爷爷往上的祖先，我不知安葬何处。或许在山东。

早自1894年我国甲午战败起，父亲就开始忧心国家命运，质疑清政权。所以，中了举，他也没想去衣食清朝官禄。中举两年后，1905年，他结束邹寨坐馆回到新蔡县，与本县几位开明志士办新学堂，任县立高小校长。从那时起，他立志教育，二十多年后，终于在新蔡办起了从小学到高中全有的“今是学校”。那是后话。1906年，他转到一位叫王建功的人家坐馆。这一年，我的奶奶去世了。

奶奶去世后，父亲投身反清，曾逃亡数年，家还被抄。他一直以教读为业，母亲则在家带女儿。因此，家里条件，只是少有改变。直到1920年我出生后，父亲在外做事几年，家境才好起来。不过，住的一直还是茅草房，屋里地面也都是土地，但仓